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政治逻辑与商业效用：解读胡锦涛赠言闾丘露薇事件

时间：2003-11-23 9:13:06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毛升 阅读773次

[摘要] 本文以胡锦涛赠言闾丘露薇事件为文本, 分析这一偶然事件对于非典时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建、社会动员能力的汲取、危机管理所发挥的作用, 以及它的商业价值。

[关键词] 合法性 安全 本份

political logic and commercial utility : analysis of the event that Jintao hu
gived words of advice to Luweiluqiu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vent that Hu gived words of advice to Luqiu ,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t can exert effect on re-build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
gaining social mobilization ability, crisis managing during the SARS period, and
it has commercial value as well.

[key words] legitimacy security duty

引言

这样的事情并不会经常发生, 尤其在中国国家领导人身上。莫斯科时间5月29日下午, 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晤活动的胡锦涛主席, 在前往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之前, 在下榻饭店的大堂专门会见了前来莫斯科采访的香港记者。问候完记者后, 胡锦涛介绍了访问俄罗斯的成果, 并重点回答了记者尤其关心的关于国内防治非典型肺炎情况以及中央政府如何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防治非典的工作, 如何看世界卫生组织取消了对香港的旅游警告等等。会见结束时, 胡锦涛看到了人群中凤凰卫视的女记者闾丘露薇。他走上前问: “你怎么样? 你好吗? 看你去伊拉克采访, 既为你的精神所打动, 又确实很为你担心。后来知道你安全回来了心里才踏实。我送你两句话: 第一, 事业要追求; 第二安全也要保证。好不好?” 闾丘露薇回答: “好! 谢谢主席关心!” 该事件成为那个非常时期的一个小插曲, 并迅速为除中央电视台之外的很多大众媒体所津津乐道, 凤凰卫视更是以此为契机, 进行大量、集中的报道、评论, 籍此提升公司形象。在关于该事件的解读中, 人们形成了两条分析路径, 一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盛赞胡锦涛对记者的关心, 完成了关于胡温新政“执政为民”的叙事; 另一条路径则是夸奖闾丘露薇的敬业精神, 以“战地玫瑰”相誉, 用三进阿富汗、二入伊拉克的“传奇”为脚本, 塑造了一个孤胆女英雄的神话。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游离出了事件得以产生的复杂社会背景, 无法呈现该事件以及该事件发生后各种力量如何借力该事件的诸多面向, 不免流于单薄。本文试图将该事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中, 从党-国、组织两个层次, 政治、社会、经济三重视域切入该事件, 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一种有别于现有各种分析的另类视角。这当然是一种带有迩达默尔所谓的“偏见”的论

- 娱乐广告传播模式
- 寻找“直指本心”的广告
- 企业新闻运作策略全析
- 焦虑性编辑倾向对报纸...
- 英雄形象传播的新趋势...
- 论卫星传播对国家主权...
- 关于消除中国数字鸿沟...
- 关于消除中国数字鸿沟...
- 从“广东非典型肺炎事...
- 修辞学观照中的视听传播

释，至于能否自圆其说，请读此文，并且发言。

“安全”的政治

这显然是一起偶然事件。没有先兆，更没有彩排，一切显得非常自然、可信，且有一层温暖的底色。但一旦将这起偶然事件放置在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偶然之中也蕴涵着一些必然。这庶几也符合辩证法的逻辑。

首先，该事件发生在5月29日，现在我们知道那时抗击非典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由于非典的强传染性、不可控性，尽管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但前景依然不够明朗。恰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指出的身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人由于不能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因此并不能清楚知道现在已经处于事件的什么阶段。（1）可以说如何战胜非典仍然是政府当时的头等大事，丝毫不能懈怠。非典的肆虐对党-国最大的威胁就是政治合法性的急剧丧失，从而使政治稳定成为一个问题。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统治的心理权利”，也就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2）卢梭认为人民拥有的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当权者应该忠于的最终价值，谁丧失公意，谁就丧失合法性。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马克斯·韦伯

（Max·Weber）所谓的传统的合法性（3）不同，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当然，“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共政权的持久性还来自于长期武装斗争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即卡里斯马型，以及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巨大的组织资源。（4）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因素逐渐流失，中国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凸显。“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在不断下降，党和政府及领导人的威望大不如从前；对抗政府政策法令的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央政府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无法顺利施行；怀旧心理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更普遍存在的是一种逆反现象，凡是来自上边的意图、决定，都会引起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5）与所有威权政治（6）一样，中共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努力，除了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利用民众有时甚至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进行强硬的政治控制外，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政府的绩效——主要是经济增长，来降低民众对于威权政治体制的批评力度，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于是在国家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上逐渐形成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确信经济的增长就能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观念。用一组公式来表示就是：“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政治稳定”。（7）而为了经济增长竟置人民身体健康于不顾，各级政府隐瞒疫情，作为医生的卫生部长竟然当着世界人民公然说谎，非典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在瞬间解构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神话，造成了社会的极度恐慌，也松动了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形成了对现政府是否为负责任的政府的质询，政权的稳定遭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压力成为新成立的胡温政权的现实难题，海外媒体就有“胡锦涛一夜白头，温家宝夜半垂泪”的报道。而灾难并不仅仅止于此。5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来自中国海军的重要消息：中国常规动力潜艇（编号361）在山东省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原中国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事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问时，心情沉痛地说：“这是人民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故！”进入5月中旬，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防汛抗洪，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抗击非典一起成为需要两手抓、两不能误的迫在眉睫的大事。总之，进入2003年，安全，或者说确保安全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意识形态，能否实现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全，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政权的安全。当然，危机对一个组织来说一方面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契机，处理得好具有积极的功能效应，是组织命运“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L·科塞（Cosser）认为社会冲突有时“起分裂作用”，破坏群体的团结，甚至导致群体结构的解体；另一方面，社会冲突能够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节能力，具有一定的校正功能。（8）4月20日，高官问责制的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化等等措施，都可谓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也是危机管理的成功运作。这些前所未有的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4月20日前，北京市民平均给政府打46分，4月20日后上升到74分，60%的市民对政府的信赖度提高。亲民、高效、公开成为新政府进行危机公关的形象诉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观照胡锦涛赠言闾丘露薇事件（以下简称赠言事件），就可以看到胡对于安全的强调与政治的瓜葛。胡锦涛在谈话中表示对闾丘露薇去了伊拉克很“担心”，直到她安全回来才“踏实”，而在赠言中将“追求”“事业”放在前面，“保证”“安全”置于后面，按照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规律，这就明显强调了“保证安全”比“追求事业”更其重要。这次即兴的、有感而发的对于记者安全的关心，应该可以反映胡锦涛作为高层官员在这一非常时期紧绷的安全之弦。同时，由于危机所具有的社会传染效应（9），就促使危机主体必须主动采取相应的社会沟通，尤其是寻求与媒体的友好合作，籍此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主体应对危机所作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尤其是香港这些境外不易控制媒体，如何与之建立良性关系，获取它们的好感与支持，是危机主体的一项重要工作。胡锦涛特意“挤出时间”会见来莫斯科采访的香港记者，并详细介绍政府防治非典工作，尤其是赠言闾丘，应该可以视为危机管理中党-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体现。这次真情流露被证明是一次成功的公关，它为新政府赢得了媒体的赞许。凤凰卫视负责赠言事件宣传工作的评论员杨锦麟在凤凰卫视5月31日“时事开讲”栏目中对此的解读是：“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人很坦诚地向世界宣布，执政的理念是什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领导人不仅是说对SARS疫情民众受到感染揪心，他对我们新闻工作的人员也有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一个平实、平和、平稳的领导人的风格。他不是刻意安排的”，是对“闾丘有感而发，主动的过来了”。这是一种“人文关怀”、展现的是“一个平民领袖的风采”。与亲民的政府形象在专家的解读和媒体的强力传播中冉冉升起的自然还有政治合法性得到的重建。

从年初广东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感染病人，即使从4月20日至5月29日，一个多月的苦战，毋庸置疑，从高层官员到医护人员再到广大民众，从体力和心理都极度疲惫。在此之前，由于对非典这种突发的疾病缺乏了解，致使隔离措施不力，已经造成了大量医务人员感染，有部分医护人员死亡，也导致了医护人员的过度恐慌而不愿上岗。由于职业伦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为革命精神、政治觉悟所遮蔽，各行各业敬业精神不足，关键时刻为工作可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天职观念（10）没有树立。再加上政府权力的无限渗透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育，致使民间社群组织不能发挥作用，动员方式就只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开始形成的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的老路，利用行政机关、单位，以物质刺激、政治奖励、严厉惩罚为手段，达到动员的目的。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正在四川考察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胡锦涛到自贡市富顺县人民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吴仪致信给全国护理工作，这既是慰问，更是动员。闾丘露薇一个弱女子，尽管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豪言壮语，却出于对职业伦理的恪守，几次出入硝烟弥漫的战场如玫瑰怒放，这种敬业精神，的确让人感动。随着宏大的政治话语的逐渐“去魅”，她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成为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的品质。在我们这个思维和话语习惯于以战争为隐喻，并已经成功构筑成了一套社会生活中内部十分统一的意义和表述系统的社会，（11）将非典和战争直接勾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如“抗击非典”、“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白衣战士”等军事用语的流行也佐证了话语是社会建构的工具之一的论断。战场上记者的敬业和医院里医护人员的尽职，通过话语得到了逻辑地转化。胡锦涛被闾丘露薇的“精神”所“打动”，对她安全的“担心”，以及对“事业”和“安全”不可顾此失彼的强调，如果将闾丘露薇换成一个在“非典”一线工作的护理工作者，几乎不用大的改动而仍然贴切。这种耦合是耐人寻味的。

借势高飞的凤凰

这样的机会对凤凰卫视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1998年3月19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记者会上提醒新闻组负责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节目。”吴小莉于是一“点”成名。尽管事后吴小莉表示“自己生活并没因此而有多大改变”，只是“电话不断、访问不断、活动不断”。但凤凰卫视的地位却因此而不同。凤凰卫视的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崔强说：“当时，凤凰还是一个弱势媒体，刚开播不久，国家首脑就这样关注我们，那句‘请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好不好，我就很喜欢看她的广播’可谓点石成金，收视率一下子就上去了”。总裁刘长乐之后也有凤凰卫视靠吴小莉给饭吃的表示。当然，如今梅

开二度时，炒作依旧，但凤凰已经不再是那只刚出巢的雏鸟了。调查显示，从电视节目渗透率、收视率和现实收入三个指标来看，凤凰卫视已经是迄今最成功的境外电视频道。美兰德信息公司2001年的调查发现，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内地的渗透率为4200万户家庭，约占中国所有收视的13%。凤凰卫视还是迄今所有境外电视频道中唯一盈利的，其年均广告增幅超过81%，远远超过同期中国广告市场的增幅。(12)凤凰卫视的节目内容主要是针对内地观众设计，主要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也是在内地实现的，是否能更大面积地在内地落地是关系凤凰前途的症结点。这些都框定了凤凰卫视处理赠言事件的姿态。

凤凰卫视在赠言事件一发生，就以最快的速度在所有新闻节目中将此作为头条来报道，并加上演播室主持人对身在莫斯科的闾丘露薇的电话访问。而评论节目“时事开讲”栏目在5月31日则以《媒体责任与人文关怀》为题，通过主持人董嘉耀与嘉宾杨锦麟对话的方式，进行深度剖析。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杨锦麟更是以《闾丘精神凤凰本份》为题在《凤凰周刊》上发文，继续加以阐释。在“时事开讲”中，通过嘉宾之口，针对赠言事件，阐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一、凤凰卫视的报道一直为海内外强烈关注，甚至可以影响中共高层。二、闾丘露薇是第一位开战以后进巴格达的华语媒体记者，而且是女记者，是“前所未有的记录”，当然，也是凤凰可以骄傲的本钱。三、赠言闾丘露薇的确是一次突发事件，表现了胡锦涛一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人文关怀”。四、凤凰对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的报道同样也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做第一”是凤凰的“特征”，而“做第一”的原因是基于一种“使命感”，是试图在西方媒体垄断新闻话语权的现实中“怎么样让世界20多亿的华人社会有自己的声音”。五、驳斥了关于凤凰“刻意要做秀”的批评，因为“这个秀是要用生命的鲜血去换来的”，而“凤凰人、凤凰的老板”、“每一个凤凰人都会不忍心去看自己的同事去抛头颅洒热血，没有这个必要”。就象闾丘露薇奔赴战场是出于记者的本份一样，凤凰之所以如此投入地报道伊拉克战争，也只是因为媒体的“本份”。

“9·11”事件极大地提升了凤凰卫视的地位，其产生的“鲑鱼效应”使颜面无存的中央电视台如梦初醒，也促使央视作出惊人之举，以强大的人力、物力、频道资源全力报道伊拉克战争，这种努力的回报极其丰厚：收视率狂涨28倍。这就注定了财力相对匮乏的凤凰卫视与央视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将是伊拉克对抗美国的翻版。而凤凰的宝更多的只能押在进入危城的女记者所能创造的煽情指数上。两家电视台在最大限度满足观众对世界大事的知情权背后的商业角力，尤其是在派遣战地记者方面的斗智斗勇，其激烈程度也未必亚于前方炮火连天的战场。(13)赠言事件的不期而至，自然成为了关于凤凰对伊拉克战事成功报道的注脚，也成为堵住有人揶揄凤凰“做秀”之口的塞子，同时也以中共高层的关怀所彰显的凤凰具有的强大影响力给广告客户吃了一个定心丸。

注释：

(1) 参见[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书中，柯文从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角度分析义和团运动，指出历史学家书写历史之所以与非历史学家不同，是因为他们知道事情的结果，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而历史参与者对整个事件的了解是不完备的，而且在参与时也不能准确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最终结果，因而，他们对该事件的看法与事后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同。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的人们也并不能如我们今天一样能一目了然事件的结果，因此，在5月29日人们是否已经进入抗击非典的尾声并不能确定。

(2)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38页。马克斯·韦伯根据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不同，划分出了三种统治类型：“卡里斯马”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个人的超凡品质和能力的信仰和崇拜上；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家长制上；与前两种类型不同，法理型则是一种理性的统治，靠理性的

手段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4) 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8~89页；另可参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出版社，2000年；

(5) 孙立平：“集权·民主·政治现代化”，《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转引自毛寿龙：《政治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6) 从理论上讲，威权体制不允许各种政治势力公开竞争政府权力，以减少或者排除随政治竞争而来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民主体制的合法性是程序性的，民主的博弈规则在原则上保障统治权力更替的可行性，而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绩效，更取决于民众对威权政府所设定目标的共识程度；

(7) 梁庆寅主编：《非典：反思与对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8) 薛澜等：《危机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9) 参见胡宁生主编：《中国政府形象战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1198页。“危机问题、目标与行为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时，人群越容易受到感染，而参与运动的可能性则越大。在人群越聚集的地方和组织内，人们相互影响和传染的几率越大，危机的参与者可能越多”。

(10) “职业伦理”或叫“工作伦理”最早由马克斯·韦伯提出。他发现路德通过对《圣经》的翻译，给职业赋予了“天职”（calling）的意义。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神圣的道义力量，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职责和这一职责所内涵的道德承诺。另可参见万俊人：《义利之间》，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172~185页；

(11) 潘忠党：《“战争”作为话语中的隐喻》，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页；另可参见钟勇：《成也语言，败也语言——论语言在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里其到的作用》，载《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2000年，第276~277页；

(12) 有关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均通过google搜索引擎,从网上获取；

(13) 参见苗棣：《战争秀》，《财经》，2003年第8期，第122页。

文章管理：肖克（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政治逻辑与商业效用：解读胡锦涛赠言闫丘露薇事件 会员评论[共 0 篇]

我要评论

会员名 密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 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 追究法律责任.